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The Tokyo Trials, Japan's War Guilt and its  
Post-War Responsibilities*

#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日〕大沼保昭 / 著 宋志勇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The Tokyo Trials, Japan's War Guilt and its  
Post-War Responsibilities*

#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

〔日〕大沼保昭 / 著 宋志勇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 [日] 大沼保昭著;  
宋志勇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0963 - 4

I. 东... II. ①大... ②宋... III. 侵略战争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IV. K313.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772 号

『東京裁判 戦争責任 戦後責任』

作者 大沼 保昭

株式会社 東信堂

© 大沼 保昭, 2007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日本东信堂出版社 2007 年版本译出。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

著 者 / [日] 大沼保昭

译 者 / 宋志勇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仪莉霞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

字 数 / 219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963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9 - 347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5.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

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

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 战后责任》读后

步 平

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介绍的那样，这本书是在1985年初版发行，一直出到第四版的《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增删后，特别是在增加了关于“战后责任”的论述后形成的新的著作。这是一部围绕日本关于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认识进行讨论的有思想深度的著作。

日本战败后，围绕如何看待1931~1945年的战争，如何看待战争领导人的责任这一“历史认识”问题（作者认为这既是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评价），在日本国内及日本与周围诸多国家间始终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淡化，相反却有愈来愈强化的倾向。作者出于对这一倾向的深深的忧虑，在认真思考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透过成为历史问题表象的“慰安妇”问题、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问题，特别是靖国神社问题，从日本政治、社会、外交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虽然解决“非一日之寒”的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并不可能凭借一本书或一个人的力量，但通过这样的分析与思考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是十分必要的。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通过这部著作也可以了解有代表性的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某种

程度上，他们的观点可能代表了日本社会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看法。

## 一 日本社会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在战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50年代中期的10年，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

战争刚结束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指的是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也就是讨论作为天皇的臣民应向天皇承担的责任，而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悲惨境地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以千万计人民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但即使是对战败真正应当负责的人，包括天皇和原军部上层、政府上层的高级官僚和积极支持战争的财界首领也仍然完全保持沉默，甚至对自己的责任含糊其辞，故意提出所谓的“一亿总忏悔”。这一情况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本来是责任最重的人却呼吁那些责任最轻的人一律进行总忏悔”，同时回避了导致生灵涂炭的真正的战争责任。

当然，通过东京审判与BC级审判，也引起了日本社会上一些人的思考。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及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但由于日共具有在战前已经成为残酷的镇压对象，在战时游离于支持战争的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之外的特殊身份，虽然战后能够以相对超脱的身份对具有战争责任的人进行揭发检举，但在日本社会不具普遍意义，他们的追究没有引导社会的整体思考。

另外，也有一些在战时积极支持战争的人有了一定的醒悟，勇敢地承认了曾经支持战争的事实，对自己在战时轻易地上了军国主

义的当，受了东条英机等人的骗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有必要认真反省，并尝试在自己身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立足于自己的体验，努力使自己今后不再受骗，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否定战争。这是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战争责任追究论。作者在书中介绍的大熊信行<sup>①</sup>的情况就是一例。但是在战后初期进行这样思考的人一方面是极为稀少，而且即使是这种战争责任论，也仍然缺少思考日本对其他国家民众加害责任的立场。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10年，这是从日本社会内部首先从文学界开始进而到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层面的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较战后初期有了明显的深化，已经超越了对过去所作所为的一般性评价，不满足于对过去战争“无作为”的笼统的道歉，而是深入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向前进的实践意义。知识分子中关于战争责任论的争论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包含了对人性多方面的深入的省察。以激昂的形式点燃了战争责任论战导火索的吉本隆明<sup>②</sup>，提出知识分子应作为“悔恨的共同体”进行反省的丸山真男<sup>③</sup>，首先提出“十五年战争”观的鹤见俊辅<sup>④</sup>等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都是这一时

---

① 大熊信行（1893~1977），日本经济学家、评论家、诗人。青年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从事左翼新体诗歌运动。他对于自己在战争中作为“言论报国会”成员发表鼓吹战争的文章等行为进行了反省，写出了《战争责任问题》、《国家走向何方》、《国家恶》等著名著作。他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提出了拒绝对国家的忠诚而主张对人类忠诚这一实践原理，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② 吉本隆明（1924~ ），诗人、评论家。1950年代提出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论与“转向”论，建立战后的新左翼理论。

③ 丸山真男（1914~ ），政治学家、思想史家，战后从对天皇制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角度，深入到国家对国民思想层面的侵犯问题，提出在支持战争的问题上，知识分子应作为“悔恨的共同体”的概念，在日本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④ 鹤见俊辅：1922年生，日本当代著名哲学思想家，战后初期与丸山真男等共同创办了在日本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的科学》杂志，对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的“转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且积极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越南战争的反战和平运动，首先提出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战争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著作有《鹤见俊辅集》12卷、《战后日本的精神史》等。

期的代表人物。但是，缺少思考日本对其他国家民众加害责任的问题仍然存在。

不过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基于深刻的战争体验，结合在战后初期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从而导致思考战争责任出现了新的契机，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开始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以竹内好<sup>①</sup>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这种建立在认识对中国侵略事实基础上的对亚洲的战争责任观，是日本社会战争责任认识的飞跃。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开始考虑战争期间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问题。

这一时期以反对在国会通过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为代表，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被提上了日程。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他们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在反对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扩大越战的运动中，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一方面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的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进行了追究，同时也开始思考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与战争加害犯罪的实态，进行了相

---

<sup>①</sup> 竹内好（1910～1977），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曾多年从事鲁迅著作翻译与研究，创办杂志《中国》，提出日本人应自觉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的观点，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影响。

应的追究活动。由于靖国神社问题被提到议会，也引起了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讨论。

1982年，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国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活跃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显然，这些在新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领域在扩大，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的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制度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家基于战争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 二 大沼保昭先生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析

本书的作者大沼保昭先生对上述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与活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评述，其实他自己也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上述各阶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在一些活动中（如半民间的日本亚洲女性基金）甚至是骨干力量。作为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

他首先明确地指出了“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在掩盖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和加害责任的言论依然存在和历史折中主义思潮十分盛行的今天，清醒地看到并区分对

“战争责任”理解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种关于战争责任的理解是对日本战败所负的责任。而对这一责任也有从两个角度进行的追究，一是从战争的战略策略角度进行的追究，二是从战败导致的日本国家崩溃的角度进行的追究。而两者的共同点即完全站在日本的国家角度，其实也就是站在“皇国”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立场上进行的战术技术的思考。因为日本的战败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从日本国家的立场、从权力担当者的立场的思考，自然会导出日本内阁的“一亿总忏悔”的号召。大沼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出自政府领导人的‘战争责任论’，是非常恶劣的”，是“无法理解，做得太过分”的。因为一亿人也就是所有的日本人，“所谓一亿人的责任，实际上意味着谁也没有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亿总忏悔”的论调尽管在战后初期就已经受到了激烈的抨击，但并不等于在日本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事实上，总有一些人坚持这种导致“谁也没有责任”的立场，提出种种改头换面的“战争责任论”。也有些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战争责任论”的危险性，在“检证”了军部、政府、参谋、财界等各方面人等对日本战败的责任后，便以为完成了对战争责任反省的全过程。

第二种关于战争责任的理解是作者指出并作出客观评价的，即“在战时积极支持了战争的人在战后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尝试在自己身上找犯错误的原因；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否定战争”。关于主要产生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这种对战争责任的理解与阐释，作者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他特别举出了对自己曾经支持罪恶战争的经历并不回避，而“从充满苦闷的自我否定中最终引导出拒绝国家忠诚这一普遍性的原理”的大熊信行的历史认识，认为他的历史认识反映了存在于日本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人性最深层的分裂”。

对于不大了解战争时期日本社会状况的中国读者来说，大沼保

昭先生关于“分裂”的分析似乎有些抽象，难以理解。其实这正是作者所肯定的这种对战争责任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魅力。我是从1990年代开始接触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许多日本学者的，在与他们长期的思想交流中，才逐渐理解了经历过战争的日本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分裂”实况。我清楚地记得与写出过《战争责任论》，并从1965年开始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持续32年关于教科书诉讼的家永三郎<sup>①</sup>的谈话，他对自己在战争期间未能阻止战争的“无作为”进行的反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听了他讲述战争中的经历后，我可以想象这些人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在战争时期的人格与人性的“分裂”，所以也理解了为什么丸山真男先生将这一代日本的知识分子称为“悔恨的共同体”。作者也谈到在1963年，即他自己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的时候与大熊信行邂逅后的“惊奇”与“令人窒息的知性的兴奋”，以及由此开始把对“战争与人的问题、国家与人的问题”的思考作为自己职业选择的经历。

但是，作者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虽然较之第一种情况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些多样的战争责任论，其关注点压倒性地限定于日本国内的问题，对其他国家国民、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薄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奇妙的一致”。

这就引出了作者所全面肯定的第三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即“对亚洲的战争责任”的认识。

作者在列举了上述战争责任认识后尖锐地指出：“日本的进攻给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无论是探讨东京审判还是战争责任，却极少想到从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去找问题”，“在战争中受害的亚洲各民族在人、财产上遭受了巨大损失。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国内的责任在哪里不是问题的所在。日本全体国民作为整

---

<sup>①</sup> 家永三郎（1913～2003），日本历史学家、教育家，编写的《日本史》历史教科书由于受到文部省审查而于1965年起三次就教科书审查违宪提出诉讼，要求国家赔偿，至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持续32年的诉讼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编写起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体对亚洲各国进行了侵略，被害国民众的父母、丈夫、孩子被日本兵杀害，家园被烧毁，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但在战争责任论中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一批评真是十分的透辟。确实，直到1970年代前，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虽然在日本社会也曾几度掀起热潮，反战和平运动也方兴未艾，但为什么没有增加其他国家民众对日本的信任感呢？“对亚洲的战争责任”这一问题十分严肃地摆在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的面前。

作者在书中充分肯定了竹内好的贡献，特别指出竹内好在1959年撰写的论文《近代的超克》中，从两个方面按性质对战争进行了分类，一是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战争，二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明确提出了日本对中国的责任问题；作者还高度评价了本多胜一，认为他的《中国之旅》和《中国的日本军》等著作通过重新发掘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使日本民族认识到其对中国民族的加害性，并使之在社会上得到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给予日本普通国民的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作者通过对这些言论的积极评价，明确地把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定位在思考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责任的层面上。

作者认为，正是这第三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才能使日本真的进入亚洲，真正解决战争与战后的问题

### 三 面对共同的战后

正如作者也注意到的，1970年代以来，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8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教科书的“近邻国家原则”；1993年，细川首相直率地承认了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承认日本“通过殖民统治与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是不容置



疑的历史事实”，并发表了“表示痛切反省和真心道歉的心情”的谈话。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系列著作陆续问世；针对慰安妇设立了“亚洲女性基金”；民间支援战争被害国民众战争赔偿诉讼的市民团体和律师在积极活动。

但是，另一个必须正视的情况是，在对待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问题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仍然是负面的。大沼先生在书中对日本战后那样的努力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表示了深深的感慨，也认真寻找了原因。他之所以对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进行详细的分析，正是为了提出“对亚洲的战争责任”认识所做的铺垫，所以，他的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书卷气十足的研究成果，而是针对现实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是针对现实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是针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如何面对共同的战后设计的方案。

那么，应当如何面对共同的战后呢？大沼保昭先生强调了战后日本自觉地认识对加害国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性质的重要性。他认为“首先必须指出一个事实，这就是日本国民并没有充分地认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殖民统治中给近邻各民族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伤害，不能切身感受和理解受害国中国和韩国人民的心情”。他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客观原因：对于日本国民来说，由于战争首先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因此没有将关注的眼光指向被侵略国家的民众；而战胜国放弃赔偿则“淡化了日本政府和国民意识中‘侵略’这一概念的严峻性”。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战后的日本虽然已经不是殖民国家了，但欠缺殖民国家日本寿终正寝的意识”，这就是日本与当年被其侵略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历史问题的基本原因。“这些十五年战争的战后问题，作为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摆在日本人的面前。其中的大部分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事后责任问题，同时也是对亚洲各民族的战后责任问题”。

大沼先生强调的这一问题确实切中了日本关于战争责任历史认